

自由主义与

新文学现代性品格

ZIYOUZHUYI YU
XINWENXUE XIANDAIXING PINGE

胡明贵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本书获漳州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自由主义与

新文学现代性品格

ZIYOUZHUYI YU
XINWENXUE XIANDAIXING PINGGE

胡明贵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宰艳红

封面设计:肖 辉 石笑梦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主义与新文学现代性品格/胡明贵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

ISBN 978-7-01-012107-9

I. ①自… II. ①胡… III. ①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研究-中国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D092.6②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8000 号

自由主义与新文学现代性品格

ZIYOUZHUYI YU XINWENXUE XIANDAIXING PINGE

胡明贵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

字数:380 千字

ISBN 978-7-01-012107-9 定价:5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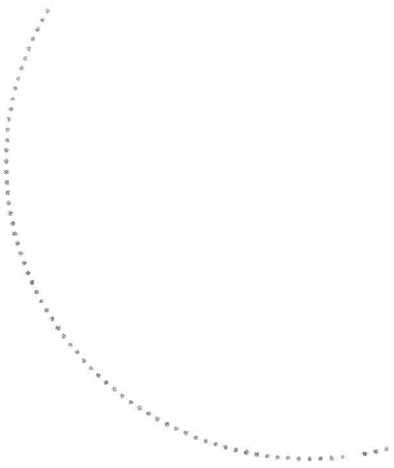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引 论	001
第一章 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通道及对现代作家思想的影响	046
第一节 留学生对自由主义的接受	046
第二节 留学生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	112
第二章 自由主义与“五四”反传统	125
第一节 什么是传统?	125
第二节 自由主义与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	127
第三节 自由主义与思想解放、个性解放及改造国民性	128
第四节 自由主义理论资源与“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	136
第五节 自由主义视角的文化反传统与文学反传统的互动	144
第三章 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现代性重构	146
第一节 自由主义话语场与文化批判 及新文学批评话语场的形成	147
第二节 自由主义核心观念与新的文学观念话语重构	157
第三节 自由主义与新文学白话文运动的话语重构	165

第四节	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及文学文体话语重构	173
第五节	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学悲剧观念话语的重构	177
第六节	现代文学批评话语重构对新文学现代 性品格的诉求	180
第四章	自由主义文化思潮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183
第一节	危机时刻：自由主义传播与 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历史机遇	184
第二节	自由主义：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思想文化资源储备	186
第三节	自由主义：新文学批评与建构的合法性论据	190
第五章	自由主义对作家主体意识觉醒及新文学悲剧品格的影响	200
第一节	个人主体意识觉醒与现代性的表征	200
第二节	新文学对个人“主体意识”的招魂	202
第三节	自由主义与新文学作家的精神认同	204
第四节	狂人、超人：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招魂幡	207
第五节	多余人：新文学的乱世哀音	213
第六章	自由主义与新文学女性叙事空间的拓展	219
第一节	自由主义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220
第二节	新文学与妇女解放运动	230
第三节	女性书写与新文学现代性悲剧审美品格	238
第七章	自由主义与新文学国民性改造书写	241
第一节	自由主义与理想国民的现代性想象的隐性视角	242
第二节	新文学作家对自由主义文化的反刍与“苦难” 视角的非人印证	247
第三节	个性缺失与性格悲剧	258
第四节	性格悲剧加剧命运悲剧	270

第八章 自由主义与革命文学话语之间的张力	274
第一节 多元与复调：徘徊在个人自由 与阶级解放之间的文学诉求	274
第二节 个人主义的余波与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的背离	300
第三节 新月派的人权运动与自由主义的演进	331
结束语 自由主义思潮：新文学无法回避而必须面对的话题	358
参考文献	369
人名索引	379
后 记	388



引 论

一、自由主义：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必要视角与研究对象

（一）为什么要从自由主义角度研究现代文学

如果要追问“中国新文学何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无疑我们必须到它赖以发生的历史语境中去寻找答案。为何要追问新文学的发生？因为这关系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品格”的探究，而“现代性品格”从形式到内容都规约着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方向和品质。试想如果没有近现代民族国家危机，中国仍然处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伦理与政治一体化的统治模式还没有解体，儒家文化没有遭到质疑，科举制度没有被废除，西方文明示范效应没有发生，中国现代化问题没有被提上日程……那么中国文学的转型还会发生吗？如果没有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在思想上没有受到自由主义文化的浸润，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还会发生吗？那些主张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等人文精神会呈现在中国文学里吗？五四新文学对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民族

独立、科学与民主、人民共和的国家想象等表达又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文学是人学”命题还会出现在中国语境中吗？如果要追问新文学这些品格，那么我想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的显著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问题，足以说明现代性对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因此对“新文学何以发生”问题的诘问，最终会归结到历史语境问题。

当时中国文学面临着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呢？我们还是用新文学运动参与者当事人的经历，即用历史见证者的见证来说明这个问题。周作人对新文学何以会发生，曾有这样的体会：“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都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的提出来了。”^①周作人这段概括比较简约，历史可能并不像他概述的那样简单，而是错综复杂得多，但起码周作人透露出这样一些信息：1. 新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的危机有关；2. 新文学的发生与西学东渐有关。

首先是危机环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最动荡的时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中，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血雨腥风中走过它凄惶的末日。时代来不及喘息并踏上“城头变幻大王旗”混乱之途——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总之，在历史的多事之秋，中国人经历着未曾有过的苦难与生存危机。面对亡国灭种危机的挑战——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援引诸葛亮的话说“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该如何应对如此危机局面？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中曾用“危机理论”来解析世界不同民族文明兴衰的过程与原因。他认为人的行动和思想，都是对环境的挑战所做出的回应。环境愈恶劣，挑战愈大时，回应也愈活跃。面对大变局危机的挑战，中华民族必须做出回应：应战。

如何应战？“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书店1988年2月影印版，第99页。

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倘若在过去，历史势必依照延续两千年的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新一轮王朝循环。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① 许纪霖的这番话揭示出，西方文明示范效应对于面对危机挑战时中国人应战方式的影响。如果没有西方的文明示范，即使清政府再腐败，中国社会再混乱，农民起义再多，中国也只可能通过自己内部王朝的更替这种历史循环的回应来消解危机，那么它就不会踏上“西方文明示范”下的现代化之路。

其次是西学输入。“危机会令思想活跃，更会引导思想的方向。然而危机本身并不会直接决定思想和行动的内容。盖环境既由无数的刺激所组成，人不可能对所有的刺激都做出反应，人们先界定某些环境的刺激已构成危机，再据危机的性质提出各种解决方案。而决定人们会提出何种解决方案的主要因素，是人的知识水准和信仰。”^② 本来中国人原有的传统知识水准和信仰应该为解决危机提供方案，但曾受过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严格训练的士大夫阶层的认识水平和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已难以应付危机。面对西方船坚炮利的事实，面对望远镜、显微镜、地球仪、火车、电等先进科技产品，他们不仅感到自己知识的欠缺与落后，更感觉到所谓“天圆地方”、“地大物博”与“华夏文明”唯我独尊一元论的浅薄。新的危机产生了新的认识与新的思想。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出现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知识并对西方文明崇尚不已的新型知识阶层，如魏源、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甚至还应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在朝与在野人士。从他们提出的解决危机方案，如“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知识水准及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已发生了明显的偏差。偏差何以会出现？因为“危机会令思想活跃，更会引导思想的方向”。危机引导着思想的方向，使一批在朝与在野人士希望能通过思想文化解决危机，于是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

② 赵叔键：《摆荡在传统与卡里斯玛之间》，唐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输入西学就成为应变策略的必然选择。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论》中对此作过较详细的评析。他说：“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争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20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20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了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① 感觉“器物上不足”引发了洋务运动，感觉“制度上不足”引发了维新运动——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或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制度上的实践），感觉“文化不足”引发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这三个时期，除第一期的“器物”之变外（其实“器物”之变已暗含对资本主义富强本质——自由主义的探析），制度与文化不足的反应方式都直指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包括政治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

总结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变是伴随着中国社会危机与“西方文明示范”下的现代化梦想实践发生的。这

^① 梁启超：《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34年版，第834页。

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

希尔斯认为一种新的传统的产生要经过转型、构型和定型三个阶段。在转型的过程中，已有的传统一定受到异质传统的强烈冲击、挤压，使它主动或被迫发生变形，以适应新的形势。中国文化传统被西方传统的异质性因素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中国文学也在危机的挑战中不得不做出回应的姿态——转型。转型后的新文学在回应危机挑战中形成了自己一些“新”的特质，它的追求个性解放和生命价值的主体意识，它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的反抗精神，它的反对迷信、盲从、依附的科学态度，它的自我反省和文化反思的理性思维，它的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它的关心民众的平民思想，它的投身革命与民族解放的激情，以及文学回归自身，进行语言与文体变革的形式追求和新的艺术审美精神的追求等，都是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和超越传统的新锐性品格。这些“新”的特质构成了中国文学新的传统，也就是现代性品格，从而被文学史家指认为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而区别于古典文学或古代文学。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轻易就能完成的，它经历了转型、构型与定型很复杂的转换过程。而在它的转换过程中，自由主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近现代危机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经历了艰难痛苦而又漫长的抉择过程，从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诉求，到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反思，再到全面的文化现代化的选择；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维新运动，再到民主革命，这其中西方始终是一参照系与现代化标准。正是在如此的思想动机下，西学东渐思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不断插入西方异质性因素，西方物质文明的途径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甚至思维方式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企图实现民族与国家现代化的法宝。但法宝中的法宝就是西方自由主义，就仿佛地震的震源，由它传播到地面，从而引发了地面上一系列的震动变化。

为什么说自由主义是其他思潮的震源呢？一方面在于它本身的独特价值，因为它是西方意识形态、政治民主制度、文化传统、道德价值体系。回顾西方近现代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由主义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帕尔默、科尔顿在《近现代世界史》中强调说：“当时一切思想，旨

在使人自由。启蒙时代的所有思想不是在这一方面，就是在那一方面关心自由问题。”^① 霍布豪斯说：“自由主义运动是和生活共同发展起来，它关心的是个人、家庭和国家。它涉及工业、法律、宗教和伦理道德……自由主义是一支有效的历史力量。它的任务在任何地方都未完成，但它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获得了进展。”^② 韦伯回顾西方现代化史，认为欧洲经历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是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认同，使人从神权和皇权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获取了本来就属于他们的自由、权利和理性。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人们选择了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的制度。因此，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启动现代化方案，理所当然会把西方社会政治文化思潮主流的自由主义当作救国之策。它输入中国之后，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一切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在中国社会的传播、生根并形成一种风气或气候，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自由主义较早输入中国，对于其他思潮来说具有潮头的作用。有人甚至将“西学东渐”简单地归结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③ 这种观点虽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道出一个事实：没有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与影响，中国思想界就不会那么活跃。无论是反对封建专制，还是反抗现代独裁暴政；无论是个性自由解放的呐喊，还是民主共和的谋求，我们都可以看到自由主义思想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正是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输入，才在中国社会形成思想活跃的空间与阐释维度，为以后各种西方思潮的输入、传播与接受做好了思想的铺垫准备，并和其他各种思潮形成相互交汇激荡的共潮现象。

自由主义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创办的中文刊物中，已能见到谈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字。如广州传教士刊物《新闻》杂志，于1835年曾刊登过这样的消息：“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

① [美] 帕尔默、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孙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10页。

② [英]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页。

③ 闫润鱼就认为“自由主义是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谓‘西学东渐’实际上就是以自由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学说在中国的流播。”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3页。

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工商，未知尽力竭力矣。”1938年该刊又刊登一篇名为《自主之理》的文章，已大致勾勒出自由主义理论轮廓：“自主之者，按例任意而行……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奠国之律例……设使国主任情偏执，藉势舞权，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但各国操自主之理，百姓勤务本来，百计经营，上不畏，下不仇……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定，可以议论慷慨。”^①后因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西学输入停滞。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地理热兴起，中国再度出现自由主义身影。在《海国图志》中，魏源就曾高度称赞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和总统制，认为总统制打破了世袭制和终身制，“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平乎？”而实行议会制度，“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②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除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外，还介绍了英国的两院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并称赞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③姚莹的《康輶纪行》，在强调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还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提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张，但这种介绍和评论在当时已经难能可贵。

接其余续，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企业与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出现，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论著大量出现，比较著名的有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纪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的本质在于“育才于学校，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而“轮船火炮、洋枪水雷、电线，此其用也”，并不是西方富强的根本所在，所以他们共同批评了洋务运动的“器用”主张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为此，马建忠介绍

① 闫润鱼：《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54页。

② 魏源：《海国图志》第59卷，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页。

③ 徐继畲：《瀛环志略》第9卷，三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了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王韬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认为“君民共主”制度最善；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资产阶级议会中的两党制；郑观应在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则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议会制的主张。但是因为当时向西方学习还仅仅限于“器物”方向，所以王韬等人的自由主义思想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中国人比较系统地引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维新派对传播自由主义思想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严复在甲午战争深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先后在天津的《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文章，批评洋务运动学习“遗其体而求其用”的做法，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指出西方文化的精髓在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主张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精神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将自由主义的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① 他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指出西方文化的长处就在于重视个体的自由，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本所在：“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② 为了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他翻译了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著作，如穆勒的《论自由》（《群己权界论》）、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梁启超也发表了《变法能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新民说》等文章，指出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呼吁“伸民议，建议院”。他同样奉自由主义为圭臬，认为“自由者，权利之表证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

① 严复：《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② 严复：《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若夫思想自由，为凡百自由之母者，则政府不禁之……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①

无疑，维新运动为变革中的中国输入了自由主义的思想理念和救国之策，自由主义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繁荣创造了一个思想与文化激荡的条件。

辛亥革命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法令，根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原则，宣布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享有选举、信仰、结社、集会、出版、言论等权力，自由主义思潮高涨。

五四时期被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此前，由于严复等的宣传、孙中山民主革命实践活动，所以此时自由主义已不再像维新运动时期那样仅是少数先知人物的呐喊，也不仅仅是少数政治精英的立国理论与实践，它已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经过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提倡，个性解放、思想自由蔚然成风，形成一股强劲的风潮，在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陈独秀以科学与民主作为思想启蒙的两杆大旗，并放言：西方“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而不得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另，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②《新青年》、《新潮》等刊物的涌现，不仅宣传了自由主义思想，而且培育出像傅斯年、罗家伦等一批活跃的自由主义分子。

20世纪20年代以后，《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月》、《自由中国》等刊物周围吸纳了一大批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像胡适、徐志摩、罗隆基、张君勱、储安平、朱光潜、林徽因、陈梦家、梁实秋、陈西

^① 梁启超著，葛懋春、蒋俊编选：《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② 陈独秀：《东西洋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滢、凌叔华等，他们以杂志为阵地，发表自己对政治的见解与看法，期待在中国实现英美国家的民主自由政治愿望，“好人政府”运动、“人权运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一次次为自由主义思潮的激荡推波助澜。

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输入，自由主义基本思想理念，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民主、法制、反专制、反独裁等已布洒在中国大地，吸引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注意，自由主义精神渗透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律制度、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都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无疑，它是中国人民反抗暴政、抵制独裁、推翻专制、争取民权、呼唤自由平等的旗帜和有效的政治文化思想资源。而且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及影响，也为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接受起到了穿针引线的铺垫作用。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潮都有一个共同的中心轴“自由”，无论是个人的自由还是民族和国家的自由或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自由，“自由”都是它们的共同期待，也是它们之所以输入中国，与中国救亡诉求激荡成风的关键所在。而且它们之间时常出现互相渗透、吸收互补、抵抗制约等西潮共涌状态，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现象。

同时，以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的自由主义的价值共识，对其他思潮具有有效的制衡作用。这种制衡在现代中国尤其重要。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产生了三种近代思潮，即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不仅表现为对社会变革采取的暴力或革命的方式，更为主要的是对传统和经验的立场和态度。激进主义崇尚“宏大叙事”，主张采取暴力或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颠覆传统、摒弃经验，它对陈旧的观念与制度具有毁灭性力量，但其本质是一种“乌托邦工程”，且难以避免自身的变异。保守主义崇尚传统和经验，是激进主义的制衡力量。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尽管主张不同，但对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都是认同的，所谓保守主义其保守或捍卫的主要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中国近现代不同时期社会思潮中占主流的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两者的混合（即在推行市场化改革中融入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公正思想），但就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式及对中国传统

和经验的立场和态度而言，它们都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中国所谓的保守主义，由于长期的集权制度，中国的传统和经验中缺乏现代价值和制度的基因，无论是近代儒家纲常秩序的信徒，还是当代阶级斗争理论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捍卫者，都是反现代性的，不能对激进主义思想形成制衡。这就使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获取了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诱导性因素。自由主义成为同激进主义相抗衡的唯一制衡力量。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动、自由主义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抗，必然反映在现代文学中，也成为现代文学现代性品格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可以说，没有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就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五四思想启蒙的勃兴，也就没有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抓住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过程，起码就抓住了西学东渐的源头与本质原因，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由它所引发的其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思潮序列变更的脉络线索与激变因素。所以，比起用单纯“阶级”或“左翼”视角来透视中国现代文学，自由主义视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全面性，它可以超越单纯的阶级视角或左翼视角审视现代文学的狭隘性和政治性，既可以联结民族自由、国家独立等救亡层面的工具理性，又可以联结个人生存自由等终极意义层面的价值理性，会帮助我们看到许多被“阶级”或“左翼”意识形态遮蔽的东西，能比较全面地审视新文学从转型到构型与定型的全貌。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结合启蒙与救亡的中国现实语境，对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作系统性考察，认真梳理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品、杂志、思潮、流派、文学传播与接受影响等互动情况，从文学史学和思想史学的角度透析出那些被遗忘的文学事件和史实，认真总结出自由主义思潮对新文学“现代品格”形成、流变的历史风貌，重新发掘它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价值。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与个人长期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研究兴趣，才将选题定为“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学现代性品格（1917—1949）”，目的是希望以自由主义为基线或中心轴，考察围绕在这一中心轴周围的文学事件、文学阵地、文学团体、文学思想、文学创作等文学现象和文学史实，以厘清自由主义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说明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影响作用。